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

梅新林 陈玉兰◎主编

Mingqing Huzhou Dongshi Wenxueshijia Yanjiu

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

赵红娟/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

梅新林 陈玉兰◎主编

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

赵红娟/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 / 赵红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004 - 9314 - 3

I. ①明… II. ①赵… III. ①文学研究 - 湖州市 - 明清时代②家族 - 湖州市 - 明清时代 IV. ①I206. 2②K8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754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45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重大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江南”的区域定位、“文化世家”的中心主题以及“丛书”系列的发表方式,鲜明地体现了《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的学术意旨。

一

“江南”是一个同时兼容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历史意涵与现实意涵的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空间概念,主要包含了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以及意象空间三重意涵,彼此有分有合,相互交融,由此形成“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

1. “江南”的地理方位

江南,即长江以南之谓也,最初为一自然地理概念,然后逐步被赋予诸多的文化意涵。在二十四史中,以司马迁《史记》有关“江南”的记载为最早:

(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

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史记·夏本纪》)

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

记·秦本纪》)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

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史记·周勃世家》)

以上所载“江南”,正如同“中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一样,仅用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涉及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所指区域范围相当宽泛,却难以明确其边界所在。可见这里的“江南”是一个泛指地理方位的“大江南”概念。

此外,《史记·货殖列传》将全国物产与民俗地理分为四大区域:“夫山西饶材、竹、谷、纻、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江南”作为与山西、山东及龙门、碣石并列的四大区域之一,同时兼具标识经济(物产)地理和民俗地理方位的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货殖列传》还有一段有关“楚越之地”与“江淮以南”经济(物产)地理和民俗地理的记载:“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以“江淮以南”与“楚越之地”相对应,则已大致确定了江南的区域范围,即主要是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

司马迁《史记》虽出于西汉,但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念则渊源有自。所以,《史记》所谓之“江南”,或许不仅代表了汉代而且也代表了此前更早时期的比较通行的“大江南”观。

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也大致沿承了这一“大江南”概念: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隋蠃蛤,食物常足。故呾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会稽海外有东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

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后汉书·刘表传》）

更始元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后汉书·循吏传》）

仍然泛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但重心似呈东移之势。

与“江南”相近的还有“江东”、“江左”、“江浙”等。“江东”又称“江左”，其地理方位的确定是由于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于是以此处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魏禧《日录杂说》对此解释道：“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芜湖、南京一带，广义是指以芜湖为轴心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大致与春秋时期的吴国相接近。以此对应于古代有关“江东”的记载，诸如《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黄歇）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史记·项羽本纪》：“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黥布列传》：“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将军（孙权）……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有关“江左”的记载，诸如《晋书·王导传》：“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邵雍《洛阳怀古赋》：“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区域范围即在狭义与广义的“江东”、“江左”之间游动。周振鹤曾从历时性的角度总括“江南”与“江东”、“江左”的关系，谓“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及秦人宽泛了，包括今天的江西及

安徽、江苏南部。这时候,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说江南可以概江东了。到了南北朝隋代,“江南”一词已多用来代替江东与江左”。^① 比较而言,尽管“江东”、“江左”与“江南”一样,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然而一者“江南”所指的区域范围相当宽泛,而“江东”、“江左”则较为确切;二者“江南”区域范围原先大于“江东”、“江左”,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的区域范围逐步缩小而向“江东”、“江左”靠拢,以至彼此可以相互替代。至于“江浙”之称,源于北宋设立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两浙路,南宋再分两浙路为浙江东路、浙江西路,区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浙江、江西全境以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元代设立江浙行省,区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全境。清代分别设立江苏省与浙江省,后人合称为“江浙”,在区域范围上与江南和江东、江左有分合。

2. “江南”的行政区划

以“江南”为行政建制究竟始于何时? 学界存有争议。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认为“徐说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由于缺少其他相关文献的佐证,《史记集解》所引徐广之说终究难以定论。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末王莽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②,此为“江南”由地理方位转化并落实为行政区划之始,然以“江南”局限于一县之区域范围,实与当时通行的“大江南”地理空间概念不相称。再至唐代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道即名之为“江南道”,区域范围涵盖自今湖南西部东至江浙地区,较之西汉王莽时首设的江南县,已在政区空间的层面与“大江南”地理空间概念相衔接。开元二十一年(733),再将江南道一分为三(江南东道、江南西

①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66页。

道、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大致包括了今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中唐时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北宋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其中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地区与上海、浙江、江西全境。元代改路为省,所设江浙行省的区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全境。明代设立南北直隶,南直隶所辖区域缩小至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全境的范围。清代顺治二年(1645)以此另设江南省,所辖与明代南直隶区域范围大致相当。

3. “江南”的意象空间

“江南”意象空间之与地理、政区空间所不同者,似乎在于更具感性化、个性化、诗意化色彩,因而令人时有随心所欲、变动不居之感。自古而今,在历代文人笔下都曾不断出现对“江南”的追忆和描述:南朝齐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咏的是金陵,显然以金陵为江南之代表。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清代严绳孙《江南好》:“江南好,一片石头城。细雨飞来矶燕小,暖风扶上纸鸢轻,依约是清明。”所写所咏也都是金陵。唐代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追忆江南之美,先总后分。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为总写江南之美。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咏的是杭州。其三:“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咏的是苏州。白居易曾先后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显然以苏杭为江南之代表。清代龚自珍《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邱》:“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所咏也是苏州,同样以苏州为江南之代表。唐代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

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清代龚自珍《过扬州》:“春灯如雪浸兰舟,不载江南半点愁。谁信寻春此狂客,一茶一偈过扬州。”咏的是扬州,则以扬州为江南之代表。元代虞集《听雨》诗:“屏风围坐鬓毵毵,绛蜡摇光照暮酣。京国多年情态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又《风入松》词:“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泮水拖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咏的是故乡江西崇仁。清代朱彝尊《卖花声》:“背郭鹄山村,客舍云根,落花时节正销魂。又是东风吹雨过,灯火黄昏。独自引清樽,乡思谁论,声声滴滴夜深闻。梦到江南烟水阔,小艇柴门。”咏的是故乡浙江秀水,皆以故乡为江南之代表。但就其总体趋势观之,多聚焦于长江三角洲地带,尤其以环太湖流域的金陵苏杭为核心区域。

综观“江南”作为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与意象空间三重意涵的演变与交融,并参考诸多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划定“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空间区域范围:“大江南”对应于长江以南地区,源起最早,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被人们所抛弃;“小江南”对应于环太湖流域,近代以来渐居上风,当代许多学者如王家范、刘石吉、樊树志、范金民、包伟民、陈学文等在有关江南问题的专题研究论著中对“江南”区域范围的界定与确认,以及如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①、周振鹤《释江南》^②、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③等对“江南”的专业性释义,也基本持此观点;“中江南”则有一定的分歧,或包括今浙江省、江西省与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大致与宋代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与两浙路区域范围相当;或将其中的江西省排除在外,接近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 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于通行的“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本丛书之“江南”所取为后一意义,同时又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

二

江南文化孕育和发展于江南区域,然后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进而引领全国、走向世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超越区域文化之上的独特意义与魅力。这是由建都、移民与文化交融三大要素综合作用于江南区域的核心成果。

1. 从文化边缘到文化中心的跨越

追本溯源,江南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与悠久的历史传统,远古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的相继出现,已经为后来江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开启了源头。然而,三代以降直至东晋之前,各主要王朝皆建都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因而全国文化中心也相应地在黄河流域作东西向移动。其间,尽管前有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建都江南,吴越文化发展成为江南区域文化的代表,后有三国鼎立时代东吴立国江南,对于区域开发、人才聚集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江南区域文化地位的上升,但终究无法改变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局面。

东晋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由中原迁于江南,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陈正祥尝谓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难”,为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①。由“永嘉之乱”引发的直接后果:一是迁都,从西晋洛阳到东晋建康,江南文化首次由边缘走向中心;二是移民,史载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发生之际,“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②,因而为安置大量北方移民而特别设立的“侨郡”也重点分布于江南地区。此后,以王、谢为代表的北方“侨姓”不仅主导了东晋政局,从“王(导)与马,共

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46页。

天下”经历“庾(亮)与马,共天下”、“桓(温)与马,共天下”,一直延续至“谢(安)与马,共天下”,而且主导了东晋文坛,通过与江南本土文化的交融与重建,最终熔铸为一种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由质而华的新江南文化精神。由东晋延续于南朝,在南北文化之间,又时时交织着士族与寒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两者一同成为本时期江南区域文化创新活力的主要源泉。“永嘉之乱”第一次波澜发之于中原,而最终落之于江南,首次确立了江南文化引领全国的中心地位,在江南文化发展史上无疑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的飞跃。

2. 从文化次中心到文化中心的回归

由隋而唐统一全国建都长安,至北宋建都洛阳,全国文化中心再次北返,江南区域文化随之退出中心地位。然而,由唐代“安史之乱”引发的第二次波澜虽然未尝导致迁都之后果,但却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大批上层移民的定居江南,对于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再至五代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吴越国、南唐经济与文化的局部繁荣,也有益于巩固中唐以来江南区域文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隋唐至北宋时期江南区域文化地位的下降,只是从东晋南朝的中心地位降至次中心地位,而与东晋以前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有所不同。事实上,由于中唐以来江南地位的回升,江南区域文化的积累日益丰厚,到了北宋时期已渐与中原并驾齐驱。

南宋建都临安,全国文化中心再次由中原迁于江南,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作为促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第三次波澜,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爆发,同样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迁都,从北宋汴京到南宋临安,江南文化从次中心走向中心;二是移民,本次北方大移民潮尤其是上层移民远远超过唐代“安史之乱”的第二波澜,而与西晋末“永嘉之乱”第一波澜相当,迁居重地落在以首都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只是不再如东晋特别设立“侨郡”而是让北方移民分散迁居各地,直接融入本土文化,显然更有利于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另外,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盛,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为儒学道统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活力。由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所组成的浙东学派于江南东南部的崛

起,在倡导事功与重商主张上与理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流,以及诸如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都可以视为不同文人学士群体对待市井文化挑战、重建儒学文化传统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不妨这样说,由陈亮、叶适、吕祖谦等倡导义利兼顾,甚至直接为商业、商人辩护,实际上开启了经世致用的另一儒学新传统,而且更具近世意义与活力,具有解构理学的潜在功能。所以,本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创新活力不仅源于南北文化,同时也源于士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靖康之难”第三次波澜发之于中原,而最终落之于江南,进一步巩固了江南文化引领全国的中心地位。

3. 从一元文化中心到双重文化中心的建构

元代建都大都,对江南业已形成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其结果并没有重复隋唐至北宋的北返命运,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模式:一是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大都作为元代首都,同时必然是全国政治中心,但江南因为两次文化高峰奠定的独特优势与惯性作用,依然居于全国文化中心地位;二是南北双重文化中心的形成,即江南因其区域文化优势而成为优秀人才及其文化创造成果的输出中心,而首都大都则因其政治地位而成为全国文人群体荟萃之地与文化活动中心,前者不妨称之为“本籍”文化中心,后者则不妨称之为“客居”文化中心,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明代建都南京,而后迁都北京,但仍以南京为陪都,全国文化中心业已牢固地确立于江南,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与南北双都结构相契合,明代文化中心先由二元分离回归统一,继之再成南北对应之格局。清代继续建都北京,但取消了南京的陪都建制,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两相分离、“客居”与“本籍”双重文化中心的南北对应的二元模式与元代相承,而与明代明显有别。但不管如何,在经历上述三次高峰之后,江南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牢固确立,再也无法改变。然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的坐标上看,与明代同时的西方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宗教改革等此呼彼应,成为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开创资本主义文明、实现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并逐步形成一种张扬人性、肯定人欲的新文化思潮,即初具近代启蒙性质的文

化思潮。而明代也同样进入了近世时代,一方面,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已经无法适应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文化生态与文化精神的需要,而宋元两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市民思想意识,则在不断地通过士商互动而向上层渗透,这是推动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明代尤其是从明中叶开始,由王阳明心学对官方禁锢人性的理学的变革,再经王学左派直到李贽“童心说”的提出与传播,实已开启了一条以禁锢人性、人欲始,而以弘扬人性、人欲终的启蒙之路,王学之伦理改革的意义正可与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相并观。这说明基于思想启蒙与商业经济刺激的双向推动,理学的衰落与启蒙思潮的兴起势不可当,而起于南宋的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事功之学以及陆九渊心学在江南的传播及其后续影响,便通过从王学到王学左派,由思想界而文艺界、科学界引发了连动效应。江南文化在其第三次高峰到来之际,充分地显示了源于士商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创新活力,同时也更加牢固地确立了其引领全国的中心地位。

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国际都会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元代以来传统的南北双重文化中心模式借此得以革新和重塑。在走向世界与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明清时期理学的禁锢与衰落,意味着中国文化需要再次借助和吸纳一种新的异质文化资源进行艰难的重建工作,而在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内部,已无提供新的文化资源的可能,这就迫切需要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 rebuilt 与转型,继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若以历史的眼光略作回溯,那么,可以 16 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进行“知识传教”、“学术传教”为前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代改革开放时期为前后两次高潮,前一次高潮的核心主题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 rebuilt 与转型,后一次高潮的核心主题则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基于这一历史机遇与使命,江南再次显示出了开风气之先、领时代新潮的气度与实力,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而将区域重心东移之后,于是以上海为轴心,以长三角为舞台,以环渤海与珠三角为两翼,以内陆广大地区为后盾,然后以江南区域文化带动和推动中国文化从本土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

武廷海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一文^①中曾提出“江南之江南”、“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的三阶段论,颇有启示意义。以此对应于上文所述江南文化发展历程,则从远古到东晋江南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前,为“江南之江南”阶段,也是以江南本土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历时最长,但积淀不厚,所以一直处于文化边缘地位;东晋南朝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以后,由“江南之江南”进入了“中国之江南”阶段,并在南北、士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先后形成三次高峰;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再由“中国之江南”进入“世界之江南”阶段,江南文化由此开始了走向世界与现代转型的历史新征程。

三

江南文化世家作为江南区域文化的杰出成果与重要标志,既孕育和诞生于江南区域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伴随着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1. 汉代至西晋:江南文化世家的初兴时期

文化世家发源于巫、史、子的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缓慢进程,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派传承中,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父^②,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已具早期文化世家之特征,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经学文化世家之先河。到了两汉时期,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的有力推动,由经学世家成功的家学传承,孕育和产生了一批著名文化世家,诸如彭城韦氏,南阳杜氏,雒阳贾氏,沛郡桓氏,扶风班氏、马氏、窦氏,汝南应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安定梁氏,酒泉张氏世家,等等,但多密集分布于北方,实

① 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华中建筑》2000年第9、12期。

② 《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曾于周太史处发现并与其共同整理《商颂》12篇。《史记·宋微子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欲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学者对此看法有分歧。

与当时全国文化中心一直居于黄河流域,江南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契合。与此同时,江南土著“吴姓”文化世家也正在逐步成长。唐人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①这里所说的东南“吴姓”——朱氏、张氏、顾氏、陆氏四大世家,发端于两汉时期,代表了江南土著文化世家的主体成就。除了“四姓”之外,又有“八族”之说。《文选》卷二四陆士衡《吴趋行》:“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这些土著大族一开始多为官宦家族或军功家族,随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才逐步衍化和转型为文化世家,其中以陆氏世家地位最显,贡献最大。但与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关中、山东“郡姓”相比,无论于量于质都颇有差距。此为江南文化世家初兴阶段。

2. 东晋南朝: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如果说东晋南朝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迁于江南为江南文化世家的兴盛提供了表演舞台,大移民潮中大批北方“侨姓”世家南迁江南为其提供了演员群体,那么,北方南迁“侨姓”与江南本土“吴姓”世家的冲突与交融则为其提供了创新活力。上引唐人柳芳《氏族论》所论“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同时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意义。其中“侨姓”与“吴姓”既经历了从冲突到融合的艰难历程,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生命周期,但居于主流地位的仍是外来“侨姓”世家,东晋皇权从“王(导)与马,共天下”经历“庾(亮)与马,共天下”、“桓(温)与马,共天下”,到谢安出将入相,指挥谢氏家族的谢石、谢玄、谢琰赢得“淝水之战”,而发展为“谢与马,共天下”,创造了谢氏世家的空前辉煌。从政治文化制度层面考察,这是九品中正制度通过赋予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权,促成门阀文化世家迅速走向鼎盛时期的必然结

^①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77—5678页。

果。所以,在以王、谢、袁、萧为代表的“侨姓”与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江南本土“吴姓”世家之间,既有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又有寻求共同应对和压制寒族世家的合作意向。进入南北朝之后,以刘裕代晋立宋为标志,庶族的崛起与皇权的复归,宣告了门阀政治的结束,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退出与走向政治权力中心过程中发生易位。然而就文化地位而言,则仍然以北方“侨姓”为主导,以本土“吴姓”为辅助,彼此一同演绎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3. 隋唐:江南文化世家的回落时期

由隋而唐统一全国之后,实施门荫和科举双轨并行制度,由山东、关中“郡姓”以及代北“虏姓”组合而成的北方文化世家群体占有绝对的优势。据王伟考证,这些世家高居相位者,依次为:韦氏 20 人,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各 17 人,博陵崔氏 15 人,赵郡崔氏、陇西李氏各 12 人,京兆杜氏、弘农杨氏、荥阳郑氏各 11 人,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各 8 人,琅琊王氏 4 人,河东薛氏、柳氏各 3 人。^①与此同时,这些世家也都通过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逐步形成了一个人才辈出、阵容庞大的家族文人群体,在代际延续与文化创造方面充分显示了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发展能力。相比之下,江南文化世家的实力与地位明显从高峰回落。然而由于东晋南朝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的惯性作用,以及江南原有吴姓与侨姓两大群体的长期融合,江南文化世家尚能进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据李浩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次序,在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而至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②,这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化世家的整体区域分布与流向,意味着江南区域文化以及文化世家在失去中心地位后的回升,这是唐代“安史之乱”第二次文化中心南迁波澜的重要成果。

^① 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李浩:《唐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79、142 页。

4. 宋代: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五代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吴越、南唐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局部积累,已为宋代江南文化世家优势的恢复直至形成第二个黄金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宋代承续隋唐科举制度而在多方面加以改革与完善,一是着眼于制度自身的严格规范,以便于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制;二是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最为重要的进士为例,唐代录取进士总量为7516人,宋代增至36131人^①,为唐代的4.8倍,这就为一大批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和改写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才真正起到了抑制豪门、提携寒族、加快社会阶层流动,不断为统治阶层补充新鲜血液的作用,由科举产生的科宦世家才真正成为士人阶层的主体。

北宋时代,尽管仍然建都北方,但由于江南书院教育的高度发达,家族举业教育与文化学术传承的巨大成功,在当时几乎唯以科举为仕途的制度设计与时代氛围中,江南文化世家逐渐脱颖而出,较之北方世家普遍拥有更多的优势。范纯仁《上神宗乞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云:“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宋代江浙闽蜀之所以能成为科举最强、人才最盛的地区,即受惠于书院与家庭教育的高度发达及其与科举制度的成功对接。即便如钱塘钱氏世家这样的旧豪门也在转型为新兴科宦—文化世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钱氏十三世孙钱国基的《钱氏宗谱》卷三统计,宋代钱氏擢进士者有三百二十余人,其情势之盛、人数之多为其他家族所不及。^② 科举的发达不仅再度奠定了钱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也造就了钱氏家族文人群体的庞大。厉鹗《宋诗纪事》著录有钱氏能诗者包括钱惟演、钱惟济、钱易、钱昆、钱勰、钱端礼等三十余人,其中钱惟演与杨亿、刘筠同为宋初西昆派领袖,

^① 吴建华:《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② 参见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